

关于秦观的《调笑转踏》词

赵晓兰

秦观的《淮海词》中有一组《调笑转踏》，共十首，每首均以一诗一曲相间，诗为七古，曲为调笑，诗句与曲词内容相同，诗末二字和曲子开头二字相叠，诗是供朗诵的，曲是演唱的，这是宋代一种小型歌舞曲。

秦观是较早创作《转踏》的文人之一。据王灼《碧鸡漫志》卷三记载，石曼卿取“般涉调《拂霓裳曲》”“作‘传踏’，叙开元天宝间事”。石曼卿，淳化五年（994）生，康定二年（1041）卒，年辈较秦观（1049—1100）早。“传踏”，即“转踏”。石曼卿所作传踏早已失传。曾慥《乐府雅词》卷上录有无名氏《集句调笑》八曲、郑仅《调笑转踏》十二曲、晁补之《调笑》七曲、毛滂《调笑》八曲。郑仅（1047—1113）、晁补之（1053—1110）与秦观（1049—1100）是同时的诗人，毛滂较秦观略晚。无名氏《集句调笑》制作的时间不详，但从入队词“集古人之妙句”，且集有贺铸《踏莎行》中“凌波不过横塘路”“无端又被东风误”等句看来，既称“古人”，制作时间当在贺铸卒后（贺铸卒于1125年），可见秦观写《调笑转踏》的时间确是较早的。

《转踏》所用曲调多为《调笑》。调笑，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二录有王建、韦应物《宫中调笑》及代叔伦《转应词》（《乐苑》曰：《调笑》，商调曲也，

代叔伦谓之《转应词》）。所谓“转应”，“因词中有展转相应之句也”（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现将王建《宫中调笑》抄录如下：

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

王建的《调笑》，共三十二字，凡三用韵，韦应物、代叔伦的《调笑》《转应词》均与此相同，他们大体写闺情，边怨，徒歌不舞，也不具叙事性。

这种只有二、六字句，以抒情为主的《调笑》在秦观等人手中却有了相当的发展。秦观的《调笑转踏》之二中的《调笑》是这样的：

鞦韆路，江枫古。楼上吹箫人在否？菱花半壁香尘污，往日繁华何处？旧欢新爱谁为主，啼笑两难分付。

全词三十八字，仄韵，句句押韵，一韵到底。音节迫促，感情紧迫低抑。字句也从只有二、六字句变为有二、三、六、七字句，句式参差，宜于表情（余九首皆同此）。

据现存资料，秦观是最早使用《调笑》新体式的词人。《历代诗余》录有孙光宪《调笑》一首，三十八字，仄韵，句句入韵，与宋代《调笑》体式相同。但细绎之，孙光宪的《调笑》与秦观《调笑转踏》之七《采莲》曲子全同，而《花间集》《尊前集》均未采录孙光宪此词，疑为《历代诗

论》误收，而苏轼的《调笑》仍沿用唐人旧体。秦观熟谙音律，新体《调笑》有可能就是他创制的。

转踏，“与唐人调笑词、转应词、踏歌皆有关”（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

“踏歌，队舞曲也”（陈旸《乐书》）。踏，似指歌舞时踏地为节；转，似指曲调反复相映，诗词内容也展转相映。刘禹锡所作《踏歌》即有“新词宛转递相传”之句。这种队舞曲根源很早，从民间传入宫庭，又从九重传出。据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记载，汉高祖时，每到十月十五日，宫人“共入灵女庙”“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后汉书·东夷传》也称：“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唐代，踏歌亦深为皇帝喜爱。“玄宗尝命张说撰之夕御前踏歌词”（《唐音癸签》卷十三）。“（玄宗）先天初，上御安福门观灯，令朝士能文者为踏歌”（《辇下岁时记》）。从《新唐书·礼乐志》十二记载宣宗年间队舞的情况看，当时踏歌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张说御前所作踏歌词见于《乐府诗集》卷八十二，《乐府诗集》保存的踏歌，还有崔液《踏歌词》、谢偃《踏歌词》、刘禹锡《踏歌行》。将上述作品细细研讨，可以看出，唐时踏歌均入乐，歌舞相兼，基本上表现歌舞盛况，并不具叙事性。

值得注意的是，崔液等四人创作踏歌时采用的诗歌样式并不相同，现大致按作者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谢偃（？—643） 五律
崔液（672—713） 五古
张说（667—730） 七绝
刘禹锡（772—842） 七绝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称：“元和初，有一士人……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

霜。’”所歌仍为七绝。

如果考虑到五言诗起源早于七言，七绝又早于七律，可以认为，踏歌的作者一般都采用最熟悉的诗歌样式入乐以供歌舞者演唱。如果这样，秦观等人用当时最流行的长短句，且“词中有展转相应之句”的调笑令写作转踏就是很自然的了。踏歌采用熟悉的诗歌样式入乐还可以从南宋作者中得到佐证，朱敦儒《踏歌》及辛弃疾《踏歌》就是采用当时已广有作者的长调词入乐的。

秦观的《调笑转踏》不仅在形式上有创新，在题材内容上也很值得注意。

将秦观的《调笑转踏》与郑仅、晁补之等的同类作品比观，它们的题材来源是不同的。

郑仅所作《调笑转踏》十二首题材的来源是：

1. 乐府《陌上桑》
2. 《唐书·乐志》
3. 《琴集》
4. 《幽明录》
5. 乐府《结客少年场行》
6. 辛延年《羽林郎》
7. 乐府《采菱曲》
8. 乐府《苏小小歌》
9.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10. 白居易《长恨歌》
11. 乐府《采莲曲》
12. 未详

晁补之所作《调笑》七首题材的来源是：

1. 《吴越春秋》
2. 宋玉《讽赋》
3. 乐府《大堤曲》
4. 刘向《列仙传》
5. 武则天《璇玑图序》
6. 李贺《唐儿歌》
7. 刘禹锡《忆春草》

秦观所作《调笑转踏》十首的题材来源是：

- 1.《西京杂记》
- 2.孟棻《本事诗》
- 3.元稹《崔徽歌》
- 4.薛调《无双传》
- 5.《丽情集》
- 6.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并序》
- 7.元稹《会真记》
- 8.乐府《采莲曲》
- 9.南卓《烟中怨》
- 10.陈玄祐《离魂记》

郑、晁的作品，多取材乐府诗及前人诗歌，其中有不少泛咏的。而秦观的《调笑转踏》则多取材于唐人小说，很多是民间流传的奇闻异事，大体每首专咏一人（也有个别泛咏的）。因而和郑、晁的作品相比，秦观的《调笑转踏》重叙事，虽然还相当简略，但毕竟已有了明显的情节因素，这是秦观的《调笑转踏》与《调笑》、《踏歌》和郑仅、晁补之《调笑转踏》不同的地方。

现在来看看秦观的《调笑转踏》叙事的特点：

王昭君
诗曰

汉宫选女适单于，明妃敛袂登毡车。
玉容寂寞花无主，顾影低徊泣路隅。
行行渐入阴山路，目送征鸿入云去。
独抱琵琶恨更深，汉宫不见空回顾。

曲子

回顾。汉宫路。杆拔檀槽鸾对舞。玉容寂寞花无主。顾影偷弹玉筋。未央宫殿知何处。目送征鸿南去。

《调笑转踏》有明显的叙事性，而叙事不是惯于抒情的《调笑》所擅长的，于是诗人便在曲子前的口号上下工夫。口号为七言古诗，可以用来概括主人公遭遇，诗还能写景，景中自然有情。口号的朗诵，既使得表

演富于变化，又弥补了曲子叙事不足的弱点。因此，上面所举的七古诗，从“汉宫选女”起，明妃登车、玉容寂寞、顾影低徊、渐入阴山、不见汉宫，叙事清楚，有条不紊，具有明显的叙事性。而诗后的曲子，只截取昭君回顾汉宫的场面，细致地抒写了她的心情举止，和诗相比，低徊曲折，更具抒情性，可见秦观对诗词的不同功能有足够认识，并能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灵活运用诗词的不同特点。将叙事完整的口号与侧重抒情的曲子合二为一，既朗诵又演唱，既叙事又抒情，载歌载舞，歌舞相兼，这就是秦观创作的《调笑转踏》。

《调笑》为商调曲，“商调凄怆怨慕”（周德清《中原音韵》）。因而秦观在《调笑转踏》中叙述的故事，基本上是悲剧性的。词的艳科、应歌的传统，决定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全为女性。这些女主人公，每人都有一段凄怆曲折、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她们中固然有身份高贵的王昭君、乐昌公主、崔莺莺，但更多的是身为下贱的平民妇女、妓女，她们动人的姿容、过人的才情、不幸的身世遭遇令人爱慕、令人同情、也令人悲叹，这种人情味十足的题材内容、歌舞相兼的艺术形式，对观众颇具吸引力，很适合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因此，《转踏》在当时确是比较流行的。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抒情的，而这种抒情诗一直有着浓厚的叙事因素。中唐前后，“抒情诗中的叙事因素更加浓厚”“预示着文人创作现实主义叙事文学时代的来临”（张碧波、雷啸林《史诗·抒情诗·叙事诗》）。宋代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扩大、社会生活日趋世俗化，《调笑转踏》这时便应运而生。它植根于宋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上承中唐叙事文学。事实上，北宋熙丰年间正是民间叙事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说话”盛行，孔三传首创诸宫调。秦观等人努力从民间

文学中吸取营养，他从《西京杂记》、《无双传》、《会真记》等笔记、小说中取材，将《调笑》数首联合，并以诗词相间，分咏美人，各咏一事，将《调笑》《踏歌》等形式短小而单调的抒情文学发展成歌舞相兼的转踏，虽体制仍较短小，但已较富变化，写世俗生活，题材内容富于人情味，且已初具叙事性和表演性，这是秦观等发展词体的结果。

《转踏》是在民间文学影响下产生的，它对戏曲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北宋末

年，《转踏》体制渐变，入队致词变为引子，放队词变为尾声，曲前之诗亦变用他曲，这种“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的组成形式对诸宫调、元杂剧都有影响。诸宫调联套方式即为组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或不不同的只曲并附以尾声，“元剧中正宫套曲其体例全自此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应当说，在词体的开拓上，具叙事性和表演性的《转踏》的形成和对戏曲发展产生的影响，秦观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

· 文海拾零 ·

《文心雕龙》校文一则

大明

《文心雕龙·才略》云：“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辨之富矣。”今案：此言陆贾著述情况，但“选典诰”一语文有讹误，故义有所不明。“选典诰”疑本作“撰《新语》”。《汉书·艺文志·诗赋》著录“陆贾赋三篇”，《孟春》当为其中一篇之名（原文已亡佚）；而《史记》、《汉书》陆贾本传又皆载其作《新语》，故刘勰言其“赋《孟春》而撰《新语》”，于义甚明。考“撰”乃本字，“选（选）”盖其借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历撰列辟”，《集解》引徐广曰：“‘撰’一作‘选’。”是二字通用之例。又，“典诰”乃“新语”之误。《文心雕龙·诸子》言“陆贾《典语》”，“典”乃“新”之误，孙诒让《札迻》卷12辨之甚详，可参。《才略》“典诰”之“典”，亦“新”之误；其误则与《诸子》相类。而“诰”又“语”之形近而误。由“新语”而“典语”，再由“典语”而“典诰”，愈讹愈烈，后人遂莫能得其颺理矣。今作以上校正，或于治《文心雕龙》者有一补焉。

· 学术动态 ·

教育系注意引进外国教育经验

本学期以来，教育系注重教育科学的研究，尤其重视对国外教育经验的学习。

为了有比较地进行国内外教育科学的研究，学习并借鉴东、西方国家的教育经验，促使我国在本世纪末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今年三月份，教育系先后邀请来华访问的日本竹新学院教授松岗武先生、山梨大学副教授山下兹夫先生来系，向师生分别作了题为《中日大学生色彩心理比较及幽默教育的意义》、《日本残障儿童教育的现状》的学术报告；四月份，又请曾对美国、朝鲜的教育作过专题考查的四川省教育委员会原副主任张凤山同志，向师生们介绍了美国、朝鲜的教育现状。师生们反应：他们的学术报告，对于开拓视野，瞄准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进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展教育科学的研究都有裨益。

（邓奎金）